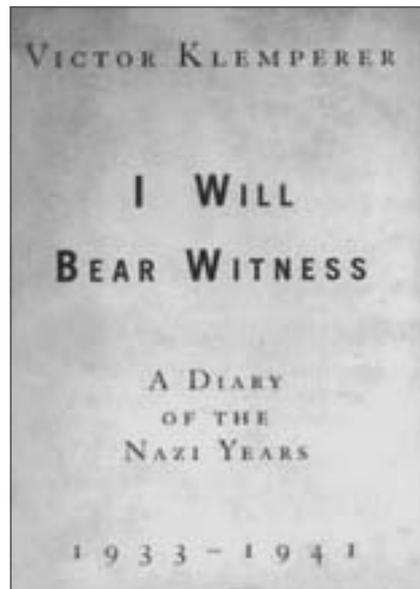


# 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

• 徐 賁

克萊普勒在德國納粹時期所寫的日記《我會作見證》給讀者留下一個非常難得的現場見證，讓我們有機會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看到納粹極權統治是如何逐漸升溫，終於成為人間煉獄。



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33-1941*,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在暴虐的極權統治下，普通民眾所經歷的是怎樣的一種日常生活呢？對於所有沒有直接經驗體會的人們來說，要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只能依靠三種敘述途徑，那就是歷史學家的客觀還原、小說家的想像描述和親身經歷者的實錄見證。在這三種敘述中，親身經歷者，尤其是倖存者的實錄見證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寫歷史或者寫小

說是替別人記述，作見證卻是替自己說話。正如羅馬尼亞裔猶太人、猶太大屠殺倖存詩人塞南 (Paul Celan) 所言：「沒有人能代替見證人作見證。」<sup>①</sup>見證是一種在倖存者個人身上聯繫着過去和現在的知識。當事人憑藉這一知識，弄明白他以前的經歷和他現在的存在。一旦倖存者將這種非常個人的體驗和知識與他人共有，他的見證也就獲得了可貴的公眾性，成為公共記憶的一個部分。

受難者作見證是一種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學家馬各利特 (Avishai Margalit) 所說，人們在苦難發生時苟活。大多數人苟活，確實只是為了苟活，「只有少數人活下來是為了作見證。」但這些少數人卻為所有活下來的人創造了一種「活下來」的意義和理由。那就是，「在最嚴峻的逆境中，努力像為自己生命作主那樣對待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作主，這是一種使命，「一種講述自己的故事，帶着見證意識活下來」的使命<sup>②</sup>。哪怕是那些曾經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們，在可以講述苦難的時候，只要他們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樣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義。

克萊普勒 (Victor Klemperer) 是在苦難發生的時候就立志作見證的

人。他在德國納粹時期所寫的日記《我會作見證》給讀者留下的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現場見證<sup>③</sup>。《我會作見證》讓我們有機會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看到納粹極權統治是如何逐漸升溫，愈演愈烈，終於成為人間煉獄。克萊普勒沒有逃離納粹德國，但也沒有讓自己成為極權統治下的「自然死亡者」。他用日記記下了一個猶太人知識份子，在德國納粹時期的生活經歷，為後世讀者保留了一份極權統治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記錄。

## 一 「我要作見證到最後一刻」

克萊普勒日記所記錄的納粹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與許多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見證作品不同。後一類作品包括弗蘭克 (Anne Frank) 的《女孩日記》、威瑟爾 (Elie Wiesel) 的《夜》、利瓦伊 (Primo Levi) 的《如果這是一個人》、塞南的詩歌、芬克 (Ida Fink) 和阿培菲德 (Aharon Appelfeld) 的小說、華沙猶太人起義領袖捷尼亞科夫 (Adam Czerniaków)、歷史學家林格本 (Emanuel Ringelblum) 和卡普蘭 (Chaim Kaplan) 等人在華沙寫的日記，等等。

許多大屠殺見證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事後的回憶或反思，而克萊普勒所提供的則是與時事同步進展的事實記錄和感受。大屠殺見證作品的作者在二戰期間，有的被迫躲藏，有的居住在猶太人的圈禁區，有的被關在集中營，都是生活在一個很小的特殊世界裏。與他們不同，克萊普勒一直生活在德國的

心臟城市德萊斯頓 (Dresden)。作為德萊斯頓大學的知名教授，他所觀察和記錄的德國日常生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由於克萊普勒的語言學專長，他對納粹宣傳對普通德國人的影響，對納粹語言如何左右德國人日常生活想法、情緒和行為的現象，都有特別細緻和深入的觀察。

克萊普勒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家鄉是德國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州東部的一個小鎮。他父親是猶太教的拉比。在他九歲時，父親轉向柏林任職，全家隨父移遷。克萊普勒的三個哥哥都有非常優秀的成就 (其中一個曾經是列寧病重時，由蘇聯政府特別請去的醫生)，這使他常常自相形慚。在幾經挫折後，他選擇了十八世紀法國文學和啟蒙運動為其學術專業。他於1906年畢業並結婚，在柏林從事記者工作。1914年他得到博士學位，在大學裏獲得教職。一年後，他當兵服役，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克萊普勒沒有孩子，一直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

克萊普勒一家在一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背棄猶太教，並皈依基督教。克萊普勒本人曾在前線為德國作戰，其妻是亞里安人。然而，這一切都改變不了他的猶太人「血統」身份。要不是因為妻子是亞里安人，克萊普勒早就如其他猶太人一樣被殺害了。納粹統治時期，很多「混種婚姻」(mixed marriage) 中的亞里安人一方最後都與其猶太配偶離了婚 (就像文革中成分好的一方與成分壞的一方劃清界線一樣)。他們如果選擇不離婚，就會受到各種歧視對待，這是一種對「立場不穩」和「不能劃清界線」者的懲罰。

克萊普勒日記所記錄的納粹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與許多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見證作品不同。許多大屠殺見證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事後的回憶或反思，而克萊普勒所提供的則是與時事同步進展的事實記錄和感受。

克萊普勒日記讓我們看到一對平常夫婦如何在極權統治的浪潮中被擺布，在一天一天的自然敘述中，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這個可怕的過程。這種感受與閱讀歷史著作完全不同。

克萊普勒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他對德國文化和德國語言的認同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一般的德國人，而且一直覺得自己不至於成為納粹排猶浪潮中的犧牲者。克萊普勒對德國的熱愛使得他在還有可能離開的時候，選擇了留在德國，而不願去法國、巴勒斯坦或美國。然而，現實的發展讓克萊普勒逐漸明白，他與德國的所有聯繫都改變不了他的「猶太血統」原罪。這就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無論一個人有多麼愛國，多麼進步，甚至有過甚麼貢獻，都不能改變壞階級成分血統的原罪。1940年5月，克萊普勒夫婦被強迫搬出了自己的家，住進了德萊斯頓的一處「猶太房」中。1941年9月19日起，猶太人一律必須佩戴標誌種族身份的黃星胸章。克萊普勒這時候才完全清醒，明白他的「猶太血統」原罪注定他不可能成為他所熱愛的德國的一份子。

1933年，克萊普勒開始寫《我要作見證》的時候，他是德萊斯頓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的講座教授。他和妻子剛在德萊斯頓郊外買了一塊地，準備在那裏蓋一棟小房子。這個時候的日記充滿了各種日常生活的家庭瑣事和與朋友往來的記錄。這顯然不是一部政治日記，但是政治的黑暗陰影已經從遠處漸漸逼近。是年納粹上台，希特勒成為首相，恐怖和暴力進入了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儘管德萊斯頓的中產階級還沒有太大的動靜，但納粹的狂熱已經在迅速升溫。

在1933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錄了教授朋友布魯門費德(Blumenfeld)家女僕辭去工作的事情。這位女僕說要找一份更有長久保障的工作，她覺得：「這位教

授肯定很快就會請不起女僕了。」政治形勢果然是急轉直下，先是納粹市長老來盤問，後來克萊普勒被解除教授職位。他看到愈來愈多的朋友和熟人移居國外，他們夫婦二人的生活變得愈來愈孤獨。1935年以後，政治的陰霾籠罩在克萊普勒夫婦的頭上，克萊普勒的日記也愈來愈關注政治時局的發展。政治終於入侵到他們生活的全部領域，令他們隨時感覺到死亡的威脅，生活陷入持續的飢餓和無盡的恐懼之中。

克萊普勒日記具有真正私人記事的魅力。它不同於那些專談政治、人生和藝術的「日記」。那些「思想日記」本來就是寫給外人看的，因此往往把作者最隱私、細微、曖昧、真實的個人成分刻意隱去。克萊普勒的日記卻是非常「隱私」，以至馬各利特認為，那根本是自己寫給自己的(當然也有許多論者不同意這一看法)。馬各利特寫道：「克萊普勒的日常生活記錄有一個道德目的，那可以說是……『在不再有人的地方，做一個人』。克萊普勒的日記是寫給他未來的自己讀的，那個自己也許是唯一還存活着的正派之人。」④

像真正的好日記一樣，克萊普勒的日記讓我們看到一對平常夫婦的生活，如何在極權統治的浪潮中被擺布，起伏動蕩，身不由己。我們仿如和他們在一起，恐怖地感覺到勒在脖子上的繩索在一點一點收緊。克萊普勒日記的震撼力正在於在一天一天的自然敘述中，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這個可怕的過程。這種感受與閱讀歷史著作完全不同。

納粹時期一件一件針對猶太人的迫害政策也被記錄下來。1933年

4月7日的「公務員法」，解僱所有「非亞里安人」的公立學校教師和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的職務。1935年9月15日的「紐倫堡法」，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不承認他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1936年4月，禁止公務員與猶太人結伴或配婚。1937年10月，規定各種各樣的商店只為亞里安人服務。1938年8月，規定猶太人必須在一切生意或正式通訊中使用有猶太標記的名字。1938年12月，完全禁止猶太人使用圖書館。1939年6月，清查猶太人的財產。1939年9月，禁止猶太人收聽外國電台；限制猶太人開納銀行帳戶，強迫猶太人交出所有現金。1940年初，禁止猶太人進入公園。1941年9月，猶太人開始佩戴黃色袖章……

日益加劇的恐懼成為克萊普勒日記的基調：「恐懼，那種在法國雅各賓黨統治下的恐懼。」(1933年3月22日)「我們像生活在中世紀一樣，無助無力。」(1936年9月27日)隨時隨地都有被逮捕和槍殺的危險：「我睡下的時候在想，他們今天晚上會來抓我嗎？會槍斃我嗎？會把我抓到集中營去嗎？」(1939年9月3日) 1942年6月23日至7月1日，克萊普勒因違反燈火管制而受到八天單獨監禁的懲罰。沒有書，也沒有眼鏡，處在極度的恐懼和虛無之中，他努力調動自己的記憶，好不容易「從地獄……重新爬向人間。」(1941年7月6日) 克萊普勒隨時隨地都感覺到被押送往集中營的恐怖，「更令人驚訝的消息，猶太人被押往波蘭，幾乎全身赤裸，身無分文，好幾千人從柏林被押往(波蘭)洛茲(Lodz)。」(1941年10月25日)

《我要作見證》第二卷的時間跨

度從1942到1945年，不到第一卷八年的一半。這是納粹最殘暴、最瘋狂的最後幾年，猶太人的處境也愈來愈危險，克萊普勒的日記也寫得更頻繁、更詳實。日記中不斷有德軍在東線失利的消息，也愈加清楚地表明作者要作見證到底的決心。1942年5月27日他寫道：「我要繼續寫下去，這就是我的英雄主義。我要作見證，一個準確的見證！」

克萊普勒記錄一日復一日的恐懼和末日臨頭的感覺，也記錄下生存的欲望和希望。克萊普勒盼望能活着看到希特勒完蛋的那一天。他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又總是怕活不到那一天。1942年10月24日他在日記寫道：

當我想像希特勒主義末日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希特勒完蛋以後，我有甚麼事情要做呢？我要從哪裏開始呢？我很肯定我不會有多少剩下的時間了。我已經許久沒有關注十八世紀(文學)，得更新一下知識。……是不是在第三帝國(或第三帝國語言)研究中再加一章，不，也許是一卷？第三帝國語言，這個題目是不是太狹窄？是不是該把它擴充為第三帝國思想史？還是回到以前計劃的(希特勒主義)哲學詞典？我是不是該專心地重操舊業，更新自己的學問？……想起要做這些事情，我真的很害怕。無論如何，我常常覺得，我是活不到那一天的。

克萊普勒這部日記吸引讀者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它涉及了一個敏感的問題，那就是普通德國人，還有猶太人自己，是否知道納粹已經開始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或者究竟了解到甚麼程度。從克萊普勒1942年

在克萊普勒與他人交往的記錄中，絕大部分德國人在猶太人處於極度困境時均袖手旁觀。他們不僅被納粹的仇猶思想洗腦，而且自己也是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與猶太人有所牽連，災禍便會落到自己頭上。

屠殺猶太人是不是全體德國人的罪過？對希特勒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和行為，普通德國人到底知不知情？克萊普勒的日記讓讀者察覺到，普通德國人即使不完全知情，也絕不是完全不知情。

1月1日至1945年6月10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德國民眾確實通過傳聞或者通過種種迹象，對發生在波蘭和蘇聯的屠猶罪行有一定的了解。日記在這方面有很多相關的記載。

克萊普勒日記吸引讀者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記錄了普通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真實態度。在克萊普勒與他人交往的記錄中，絕大部分德國人在猶太人處於極度困境時均袖手旁觀。他們不僅被納粹的仇猶思想洗腦，而且自己也是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與猶太人有所牽連，災禍便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以「分清敵我」來控制人與人之間的同情，是多數現代極權統治的相同統治法術。在1942年4月19日的日記中，克萊普勒記道：「這位教授因為對猶太人太友善被處以高額罰款，……亞里安人確實有害怕與猶太人交往的理由！蓋世太保痛恨一切人與人的關係。」1943年3月2日，他記道：「又發布了一道新的命令。任何人如果給將要押解的猶太人送東西，警察都可以將他槍斃。」

可幸的是，還有亞里安人冒着生命危險來幫助他們的猶太朋友和熟人。克萊普勒在日記中有十幾處提到一個叫里契特(Richter)的德國人。里契特受斯萊帕爾(Schrapel)房產公司委託，管理克萊普勒那一帶的房屋。克萊普勒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42年4月19日，他這樣記下對里契特的印象：「我想自己要見到的肯定是一條(納粹的)獵犬，因為他就是為了看管我們而被派來的。但我卻碰到了一個秘密盟友——黨所挑選的人居然這樣地可靠！真叫人高興，哪怕最後我不一定能得到好處。里契特三十出頭，和我握手，小心地關上房門，不讓隔壁的

秘書看到。他告訴我說漢斯(Heise, 前任)不得不辭職了，因為他對猶太人太客氣。如果他，里契特，不裝裝樣子，過幾個月就會有新的管理員來了，對你不會是件好事。里契特說他會幫我，他知道我們過的不是人過的日子。」(1942年4月26日)里契特後來偷偷給克萊普勒送土豆。

1943年2月14日克萊普勒記道，里契特告訴他，「這裏很快要發生屠殺了」，勸他到鄉下去躲一躲。克萊普勒記道：「我告訴他我不被允許離開德萊斯頓。(他說)我必須就在這裏躲一躲。他可以給我提供一個空房間，一個應急的地方。」後來里契特被警察抓走了。戰後克萊普勒才知道，「里契特被送到了布痕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1944年5月20日)

到底應當如何解讀普通德國人在納粹時期的行為？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很多分歧。自從戈爾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願幫兇》(*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於1996年出版以來，爭論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是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自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sup>⑤</sup>？同意或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們似乎都可以在克萊普勒日記中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實際例證。這正是克萊普勒日記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希特勒的自願幫兇》先是受到普遍讚揚，後來又受到普遍批評。關於此書的爭議集中在一點，那就是屠殺猶太人是不是全體德國人的罪過？這也是一個從4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引起史學界和其他人士爭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另一種問法是，對希特勒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和行為，普通德國人到底知不

知情？曾經產生極大公眾效應的電影《紐倫堡審判》(Judgement at Nuremberg)中，這個問題便已經被提出，從納粹的司法部長、納粹將軍太太，到普通的德國人，對這個問題幾乎是眾口一辭的回答——不知情。克萊普勒的日記讓讀者察覺到，普通德國人即使不完全知情，也絕不是完全不知情。

然而，克萊普勒日記中的普通德國人，並不都是像戈爾德哈根所分析的那樣，對猶太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戈爾德哈根認為，必須為大屠殺負責的是根深蒂固的德國仇猶文化。克萊普勒則表明，仇恨猶太人並不是德國的本土意識形態。希特勒主義利用和延續了十九世紀的奧地利反猶主義，這才使仇恨猶太人成為納粹時期德國的「正確政治思想」。但不少德國人處在又「想做好人」，又想「政治正確」的矛盾之中。1944年8月有一次空襲演習，帶隊的是一個德國人。他是一個「好人」。他先是說，要是猶太人的地窖塌了，不會眼睜睜地看着他們燒死的。但又說：「我很想幫助你們，但是你們也知道，我是不能這麼做的。」(1944年8月5日)克萊普勒日記的這則記載，為人們了解和思考納粹極權統治下普通德國人的集體罪過問題，提供了難得的一手材料。

克萊普勒最後四個月的日記佔了第二卷共514頁中的173頁，詳細記載作者在納粹滅亡前最後時期的生活狀況。1945年2月13至14的日記是在2月22到24日補記的。克萊普勒一次去送通知，被通知的許多都是病人或有小孩的母親，他們都是下一批押送往集中營的對象。克萊普勒知道再下一批就輪到他自己了。盟軍在1945年2月13至14日轟

炸德萊斯頓。當時火光衝天，克萊普勒找不到妻子，臉上受了輕傷。他抓住裝日記的袋子，衝過大火，逃到易北河邊，看着那個像「洛可可珠寶盒」一般美麗的德萊斯頓在大火中燃燒。2月14日天亮的時候，他的妻子找到了他，一把撕去了釘在他胸前的黃星標記。他知道，自己已經自由了。

## 二 日記和真實的存在

克萊普勒日記一出版，就很自然地令人聯想起猶太女孩弗蘭克的日記。但就歷史價值來說，克萊普勒的日記要高很多。克萊普勒是一個學者，他記錄的不僅有豐富詳實的日常生活細節，而且更具備敏銳的社會、政治觀察和對人性、人情的體會。克萊普勒更是一個語言學家，他的日記記錄了許多與納粹意識形態有關的日常語言現象和由那種特殊語言所塑造的國民思想和心態。他的日記提供的是當時德國日常生活的環境氛圍，這令人想起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記記錄的十七世紀德國、聖西蒙公爵(Duc de Saint Simon)日記中的十八世紀法國和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日記中的十九世紀英國。

但是，與這些著名日記不同的是，克萊普勒的日記是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冒着生命危險寫作和保存下來的。他的日記每隔一段時間，都得由他妻子秘密帶到德萊斯頓郊外一個叫庇那(Pina)的小鎮，藏到一位友人的住處。這使人想起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1984》中，溫斯頓把日記偷藏在牆洞裏的情形。在納粹德國，克萊普勒寫的

克萊普勒是一個語言學家，他的日記記錄了許多與納粹意識形態有關的日常語言現象和由那種特殊語言所塑造的國民思想和心態。他的日記提供的是當時德國日常生活的環境氛圍。

克萊普勒日記中對納粹德國現實、實質和統治機制的觀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他對日常語言的文化分析。這種分析也體現了一個人文學者在逆境下如何把「學問」當作一種人的真實存在方式繼續下去。

是隨時可以令人丟失性命的「反動日記」，他寫日記是為了「作見證到最後一刻」。他的日記見證的是那個殘暴的納粹極權統治。冒着危險和不冒危險而寫的日記需要不同的道德勇氣，而道德勇氣正是歷史見證最重要的價值基礎。任何「罪人日記」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道德見證價值，都是因為有一個考驗記錄者的殘暴環境。

以今天人們對納粹德國的了解來看，克萊普勒日記的客觀、真誠和對社會、政治的理解都超過許多同時代人。把克萊普勒的日記和他的兩位同時代人的日記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容格 (Ernst Jünger) 是一位勤於寫日記的作家。他是德國一戰時的英雄、文學名人。容格堅決反對魏瑪帝國，一度接近納粹，甚至為納粹黨報撰稿，把自己的著作寄贈希特勒。但是，納粹當政時期，他看透了納粹的殘暴，甚至在小說《在大理石山崖上》(Auf den Marmorklippen) 中諷刺納粹。二戰期間他旅居巴黎，但駐守在那裏的德國國防軍當局還是允許他出版了日記的第一卷。1945年，這一卷日記與後來的九卷一起再版的時候，容格刻意刪去了其中因他與納粹的關係而有損形象的部分。這種經過修飾的日記，其歷史價值當然不能與克萊普勒的原始日記相比。不僅如此，容格日記把仇猶僅僅當作一種德國惡俗來記載，對猶太人的命運抱着一種居高臨下的冷淡態度，使得他的日記遠不能成為苦難時代的道德見證。

小說家、詩人和記者克勒帕 (Jochen Klepper) 的日記則是另一種情況。克勒帕是亞里安人，妻子漢妮 (Hanni) 是猶太人，處境與克萊

普勒相仿。克勒帕深愛自己的妻子，儘管他因為有一位猶太妻子而失去了工作，但堅持不與她離婚。他通過與納粹熟人的關係，保住妻子不被押送，但終因保不住女兒，一家三口於1942年11月開煤氣自殺。克勒帕以極大的道德勇氣，信守與妻子的誓言，但他遠遠低估了一般德國人接受納粹極權的暴力和仇恨意識形態的程度。一直到死，他都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自己的祖國可能犯下這麼嚴重的罪行。就幫助當代讀者了解納粹統治現實和實質而論，克萊普勒的日記要比克勒帕的日記有更高的價值。

克萊普勒日記中對納粹德國現實、實質和統治機制的觀察和分析中，最重要的是他對日常語言的文化分析。這種分析也體現了一個人文學者在逆境下如何把「學問」當作一種人的真實存在方式繼續下去。從1935年克萊普勒失去教職以後，寫作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1935年10月5日，他寫道：「我的書將我耗盡，也讓我繼續活着，給我平衡。」在克萊普勒那裏，他在戰時的寫作就好比走鋼絲者手裏的那根平衡木桿，是寫作幫助他在面臨危險和絕望的情況下，把身子站直，向前行走。

在《我要作見證》中，克萊普勒記下了自己在極端環境下寫作的亢奮和亢奮過後的沮喪。這也成為一種存在焦慮的寫照。這種寫照讓我們看到了極真實的情緒起落和欲念交錯：一會兒是學者的抱負，一會兒是對虛無的恐懼；既明瞭人生的短暫荒誕，又不甘心就此消失在存在的空虛之中。正由於他體會到人生的脆弱無常，他才更為思想的收穫感到興奮。在這種心境下的寫

作，已經不再是為名為利，不是文人間的互比高低。寫作完全擺脫了學術體制的陋規。寫作就是寫作。寫作讓人覺得自己還有自由的心靈，還有思想的存在。這是思想壓迫下的寫作，也是政治壓迫下的寫作，寫作因此成為人以存在的名義而進行的抵抗。

### 三 第三帝國的日常語言

克萊普勒在日記中所作的關於德國日常生活語言的筆記，成為他於1945到1946年寫作《第三帝國語言》(*LTI, Notizbuch eines Philologen*)的主要材料<sup>⑥</sup>。克萊普勒非常關注納粹語言的特徵。他敏銳地察覺到，這種語言滲透在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成為不折不扣的大眾語言和文化。克萊普勒在受到極大限制的情況下，只能從報紙、傳單和偶然得到的書籍中獲得研究素材。作為一個猶太人，他不能去任何圖書館，不可以擁有任何亞里安作家的著作。所幸的是，他的亞里安人妻子偶爾還能從圖書館給他偷偷借來一些書籍。在二戰時，猶太人不准收聽廣播、不准看電影、不准讀報紙，甚至不能當眾交談。這些使得克萊普勒的語言研究只能呈現為片斷的思考。

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希特勒、戈培爾(Paul J. Goebbels)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帝國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

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納粹語言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面孔的集體稱呼，如「猶太人」、「德國人」、「敵人」(「人民群眾」、「階級敵人」、「當一顆螺絲釘」)。這種語言總是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如「猶太害蟲」(「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牛鬼蛇神」)。這種語言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巨大成就」、「偉大勝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萊普勒對這種語言有他自己的透視解讀法。當報紙不用極熱烈的語言談論某件事情的時候，這件事情就一定已經相當糟糕。他用這種辦法解讀德國在北非和蘇聯的不利戰況，後來都證明果然正確(就像文革中，報紙如果不用「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一定出了麻煩)。納粹語言發展出一整套能適用於各種場合的套話，用於報導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團結人民、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在納粹滅亡以後，那一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克萊普勒就此寫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天真爛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彌補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擺脫不了納粹的思想方式。他們自己察覺不到這一點。來自過去的語言用法在迷障和誘導他們。」<sup>⑦</sup>

克萊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覺意識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籠罩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便會成為他們思想的自動表述<sup>⑧</sup>。他感到納悶不解的是，為甚麼知識份子和大學教授不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清醒地意識到極權語言的毒

克萊普勒看到，希特勒等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險，在完全不能公開出聲，也似乎永遠不再能公開出聲的情況下，克萊普勒仍然拒絕沉默。哪怕是面對存在的虛無，他的寫作仍在證明，他並沒有放棄存在的意義。

害：「在那些年月裏，我一次又一次問自己同一個問題，而如今仍然找不到答案，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怎麼就能這麼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sup>⑨</sup>克萊普勒說的那些知識份子，都是從魏瑪時代過來的人，並不是從小接受納粹極權教育。要是他們從小受的就是極權教育，克萊普勒的問題反倒有了答案。在克萊普勒為之納悶的「知識者」當中，有著名導演雷芬斯坦 (Leni Riefenstahl)，她是生產這種語言的幫兇；有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他的1933年校長就職典禮演說，至今仍使人感到驚訝；還有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他使用這種語言的純熟已經因為格朗丹 (Jean Grondin) 的傳記而為世人所熟知<sup>⑩</sup>。

納粹語言對德國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於一些官方文章、口號、演說和海報的詞語之中，而更是滲透並潛伏在所有接觸過這種語言的人們的腦海中，包括那些反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人。克萊普勒意識到，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倖免。他寫道：「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國人』、『法國人』(這種有群無人的概念)來思想的嗎？我也忽視過這些人群中的內在差別。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學院裏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種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學問)嗎？」<sup>⑪</sup>

「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這從來就是極權統治為壟斷公共權力而營造的一個語言神話，但這樣的鬼話卻被知識份子心甘情願地拿來作為「學術準則」，並自覺自願地奉行遵守。克萊普勒指出，甚至連「文化批評」(kulturkunde)這種學術行為也會就此淪為一個「學術門類」，一個「學科」，把自己與現實政治分

割開來<sup>⑫</sup>。這種有名無實、裝模作樣的「批評」簡直是思想的恥辱。

克萊普勒不是小說家，不然的話，他也許會寫出像奧維爾的《1984》那樣的作品；他也不是一個「學院派」的語言學家，不然的話，他也許只會寫出一些「純學術」的語言學文章。克萊普勒是一個語文學家，一個對法國啟蒙運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他正是用語文學的觀察和分析來揭示那個他稱作為LTI (Lingua Tertii Imperii) 的「第三帝國語言」的。他稱這部研究為「一個語文學者的筆記」(A Philologist's Notebook)，不是出於謙虛，而是出於實情。「筆記」成為一種有別於學院「論文」的、更貼近現實的真實寫作方式。

在納粹時期，其他德國學者也用非學院式的「筆記」，在逆境中繼續他們的思想。著名的例子包括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 和奧巴赫 (Erich Auerbach) 的《模仿：西方文學中的現實再現》(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對「破損人生」警句式的思考正適合它那片斷、破碎的內容。奧巴赫的《模仿》則是在西方人文傳統黯然失色的時代，力圖保存這一傳統。這部著作在戰後成為比較文學經典的著作。正如奧巴赫所說，他書中作的文本細讀，不是提倡甚麼隔世的閱讀，而是因為在土耳其能接觸的西方著作實在有限。

克萊普勒與這些德國學者不同的是，他一直留在德國，而沒有像阿多諾和奧巴赫那樣成為流落在美國或土耳其的「外鄉人」。產生於「罪人日記」中的對極權語言的觀察

和分析，成為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批評」方式。它的貢獻恐怕不是在於甚麼「理論」，而是那種腳踏實地，與日常生存處境息息相關的問題意識和思想反抗。

閱讀克萊普勒的日記，並不給人帶來一種災難過去後的舒暢。相反，它倒是給讀者留下沉重的憂慮。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專制的權力還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腦的語言還在控制人的思想，習慣性的不思考和無判斷還在把人們領向自我愚昧和自我欺騙。

但是，克萊普勒畢竟讓我們看到一種在這樣的世界裏作見證的生存方式。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險，在完全不能公開出聲，也似乎永遠不再能公開出聲的情況下，克萊普勒仍然拒絕沉默。哪怕是面對存在的虛無，他的寫作仍然在證明，他並沒有放棄存在的意義。在似乎最不可能的境遇下，他觀察、傾聽、辨析和記錄。他始終沒有放棄對語言的熱愛和信心，不只是作為文學的語言，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用來彼此溝通的語言。他相信，人們應該用語言來揭示而不是障蔽真實，用語言來幫助而不是控制對方，用語言來溝通而不是阻隔群體。無論在怎樣的逆境下，只要人堅持這個信念，人的話語言辭就仍然可以有生命的、有思想的語言。

#### 註釋

① 引自Shoshana Felman, "Education and Crisi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Teaching", in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ed.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

②④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1; 157.

③ 克萊普勒日記於1995年秋在他去世三十五年之後，由德國Aufbau Verlag出版社出版，日記長達1,600頁，時間跨度是從1933到1945年。第一卷是從1933到1941年，第二卷則是從1942到1945年。1933和1945年分別是納粹上台和納粹滅亡年代。日記德文本的原題為《我要作見證到最後一刻》(*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可以說是相當確切的。這兩卷克萊普勒日記分別於1998和1999年被譯成英文，經刪節後，仍有將近1,000頁，由藍登出版公司出版，題目改為《我要作見證》。本文的克萊普勒日記引文出自英文版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33-1941*,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42-1945*, trans. Martin Chalm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⑤ 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⑥ 英譯本見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LTI, Lingua Tertii Imperii: A Philologist's Notebook*, trans. Martin Brady (London: Continuum, 2002)。

⑦⑧⑨⑩ Victor Klemperer, *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2; 27; 268; 129; 129.

⑪ Jean Grondin, *Hans-Georg Gadamer: Eine Biograph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徐 賁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